德國兒童與青少年學校霸凌研究報告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成人若想了解兒童們的行為動機以及他們過得好不好，最好的方法是直接詢問他們，然後好好地傾聽他們怎麼說。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剛剛結束的 2019 年上學年度中確實與孩子們進行了互動訪談：他們不跟家長、老師，也不與校園心理輔導老師甚或政治人物談話，他們只直接地與兒童們談話或對他們提問。研究人員從這個訪談中例如發現：60%的 8 歲孩子沒有手機、其中一半的孩童認為這樣子很好；有一半 10 至 12 歲的孩子最近被同學打了，許多人甚至被打了好幾次；或者每 6 個孩子中就有一人會不斷地擔心他們家裡到底有多少錢－並且這些孩子最常被其他同學取笑、被排擠、被同學「故意地打了」。

由法蘭克福大學針對德國 7 個邦中近約 3,450 位中小學所生進行的這項調查乃受「貝爾特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之委託而為，其結果部分令人驚訝，部分甚至令人有理想破滅的感覺。令人訝異的是，這些接受問卷調查並參加團體討論的 8 至 14 歲孩子們對於遠離現實的繽紛美好生活顯得興趣缺缺，他們表示，有許多成年人卻偏偏覺得孩子們應該會喜愛這樣的日子。

一如研究人員在 2019 年 7 月 3 日公開研究成果時表示，這些逐漸成長的孩子們對於物件、關心照顧與保護的需求主要根據一個「兒童與青少年的想像平均值」而來。例如能夠在安靜的地方學習、擁有令人信任的父母和朋友、擁有歸屬感等，都對他們非常重要。

這些孩子們在回答有關暴力與安全的問題時顯得冷靜而不抱持任何幻想，每 5 個小學與國高中生以及每 3 個綜合中學當中就有一個孩子覺得他的學校並不安全。「貝爾特斯曼基金會」董事 Jörg Dräger 先生呼籲「在此，我們呼籲政界應對兒童與青少年們提供更好的保護。」

弗柏爾塔（Wuppertal）市的學生 Sascha Stahn 剛通過高中會考，並隸屬於一個在 2017 年由 17 位孩童與青少年所組成的專家團體，他們的任務是擔任「貝爾特斯曼基金會」的顧問。少年 Stahn 也同樣表示：「我們正重新思考，如何能夠為孩童在家中與教育場所內提供更好的條件」，「也就是說，從兒童需要的角度來觀察，而不總是從大人的角度從上而下看待孩子」。這些年輕專家們不只是期待與學者在一

個平等的交流基礎上進行溝通，「我們同樣也要求政治界傾聽我們的需要，並且理解、接受我們的想法。」

少年的要求令人不禁想起最近在歐洲由許多青少年學生大量參與的「星期五救未來（Fridays For Future）」遊行活動，然而 Stahn 要求的更多。政治人物雖然無法不聽到大量訴求氣候變遷人為責任的青少年學生們的吼聲，然而「結構上」來說，其實尚未造成任何改變。這位在弗柏爾塔青少年議會為未成年青少年們權利和想法發聲，並且要求該城政府提高注意的 19 歲青少年表示：「我們必須更早與孩童和青少年溝通。」

從調查結果中也可明顯看出青少年希望有更多參與的機會：這些即將成年的人希望在與他們生活領域中相關的部分擁有比過去更多的發言權。雖然他們覺得自己在家裡或學校大部分受到認真的對待，然而他們覺得，對於與他們相關的許多決定的影響力明顯地不足，特別是許多青少年覺得在學校裡完全沒有，或僅有很少的機會可以共同參與作決定的過程。

小學就讀時間應為 12 或 13 年？完全不管學生的想法而自行決定

此調查研究的負責人為法蘭克福市的教育學者 Sabine Andresen 教授，她覺得上述結果非常引人注目，並建議學校方面嘗試提高學生參與決定的可能性。她同時針對政界提出定期調查孩童與青少年需求的要求，她表示：「政治人物只有在數據資料到達他們手上之後，才會對於民眾的需要有感覺。」例如 8 年或 9 年文理中學的學習年數對學生們就造成很大的影響，然而決策者僅是根據自己的認知而作出決定。

對此，由青少年們所組成的專家團體在其說明性手冊中提問：「如果就學時間從總長 13 年減到 12 年時（譯註：小學一年級至文理高中的就讀時間），學生們還能夠共同決定文理高中最後 3 年的教室顏色嗎？」此青少年專家團體要求決定者必須詢問兒童與青少年想要在什麼議題上表示意見，以及參與的方式為何。

此外，「貝爾特斯曼基金會」建議應該針對「什麼是他們現今成長過程中必要的內容？什麼是他們必須擁有的？以及在什麼時候他們開始體驗到排擠、貧窮與奢侈？」進行代表性的調查。提倡一個全新、專門為孩子設計的、影響政治決定的社會學報告。該基金會並強

調：從孩童作為出發點所進行的政策，首先必須要能夠打擊兒童貧困現象。來自經濟貧弱家庭的兒童一般獲得教育機會的比例較低，並且特別容易經驗到社會上的排斥，諸此種種均顯示社會支援性資源的不足。

Sascha Stahn 對上述建議感到滿意，因為他在針對與兒童相關福利的任務上，比過去的目標更為明確。它不再是僅僅涉及兒童的服裝、鞋子、課後補習，同時也包括例如自己擁有的書桌或印表機 – 以讓他們能夠列印出準備好了的學校報告。

Sascha Stahn 表示在他參與的專家團隊中，差不多每兩個人就有一人體驗過家貧的經驗，包含他自己，作為一個依賴領取「Hartz IV 失業與社會救助金」而生活的單親媽媽之子，表示：從公部門獲取的每年 100 歐元學習材料費「完全不夠」。「我對政治很感興趣，並且閱讀政治性書籍，然而在這方面我並無法獲得任何費用。」有時候也沒有錢可以跟朋友一起去看部電影。這個年輕人表示：「像我這樣的學生是無法獲得完善的照顧而能夠參加所有活動的。...現在漸漸到了詢問我們到底需要什麼的時候了。」

撰稿人/譯稿人：駐德國教育組黃亦君

資料來源：2019 年 7 月 3 日，南德日報（Sueddeutsche Zeitung）網頁新聞：「德國兒童與青少年學校霸凌研究報告」

https://www.sueddeutsche.de/bildung/schule-mobbing-kinder-und-jugendliche-studie-1.4510131